

# 建设性新闻的本土化实践研究——以新京报“悬崖村”扶贫报道为例

张可欣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中国·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 建设性新闻作为回应数字时代挑战的新范式, 其在中国的实践必然经历本土化调适。本文以新京报对四川凉山“悬崖村”长期的系列报道为案例, 采用案例研究与文本分析法, 探讨该理论在中国精准扶贫语境下被实践与重构的具体形态。研究发现, “悬崖村”报道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本土化实践范式: 在叙事上, 完成了从“视觉奇观”到“国家治理议题”的符号化转译; 在角色上, 媒体从记录者拓展为资源的链接者、进程的催化者与追踪者; 在话语上, 构建了以“解决问题”为共识、融合国家叙事、专家理性与个体经验的协商平台。这一实践深植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土壤, 为理解媒体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建设性新闻; 本土化; 精准扶贫; 新京报; 悬崖村

## A Study on the Localized Practice of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 A Case Study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rt on "Cliff Village" by The Beijing News

Zhang Kexi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Anhui University, China Anhui Hefei 230601

**Abstract:** As a new paradigm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age,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must undergo localized adaptation in its practice in China. Taking the long-term series of reports on the "Cliff Village" in Liangshan, Sichuan Province by "The Beijing News" as a case, this paper adopts case study and tex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oncrete forms in which this theory is practiced and reconstruct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liff Village" reports present a complete localized practical paradigm: narratively,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semiotic transformation from "visual spectacle" to "national governance issue"; in terms of role, the media has expanded from a recorder to a resource linker, process catalyst and tracker; discursively, they have constructed a negotiation platform featuring consensus on "problem-solving", integrating national narrative, expert rationality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 Such practice is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providing enlightenme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dia'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s:** Constructive journalism; Localizatio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Beijing News; Cliff village

## 0 引言

当今全球新闻业共同面临信任危机、“同情疲劳”等多重挑战<sup>[1]</sup>。源于欧洲的“建设性新闻”理念, 以其强调解决方案导向、面向未来、赋权公众、行动导向的核心主张<sup>[2]</sup>, 试图为新闻业提供一条超越“冲突—问题”的报道框架、参与社会修复的新路径<sup>[3]</sup>。这一理念自引入中国以来, 迅速与国内新闻界对“正面宣传”“舆论监督”与“媒体社会责任”的长期探讨产生碰撞与交融, 引发了关于新闻实践创新的广泛思考。

亦有学者指出, 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本土化, 孕育出一种“协同主义”范式——它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

下, 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核心, 以社会责任与功能导向为目标, 确立了自身的内涵与发展模式<sup>[4]</sup>。即在更强调在国家重大战略框架下, 协同多方力量推动问题的实质性解决。

理论的本土化凝结于具体的新闻实践中。既有案例研究多呈现建设性新闻的“横截面”, 例如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为背景的案例研究, 提供了观察建设性新闻在危机情境下实践的窗口<sup>[5]</sup>, 探讨了建设性新闻在特殊时期如何协助社会治理、凝聚共识。而新京报对“悬崖村”(四川凉山州昭觉县阿土列尔村)长达数年(2016-2024)的持续报道, 则展现了其“纵贯线”实践, 完整演绎了

“未来导向”“结果导向”的核心特性。本文选取该案例，旨在回答：建设性新闻的核心理念在此类长期性、连续性的中国新闻实践中，呈现出哪些具体的本土化特征？媒体如何通过叙事、角色与话语的调适，完成从“报道问题”到“参与建设”的转换？

## 1 理论透镜：建设性新闻的核心主张及其本土化关切

### 1.1 建设性新闻的西方谱系：核心、特征

建设性新闻核心主张旗帜鲜明。它直指传统新闻业长期存在的“坏消息偏好”（即“流血的就是头条”），批评这种聚焦冲突、负面与反常事件的“赤字框架”（即主要报道社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认为其长期渲染会加剧公众的无力感与社会疏离，乃至催生“犬儒主义”（即对改善可能性的普遍不信任）。徐敬宏(2020)进一步将其提炼为建设性新闻的六大特征：方案导向、未来导向、包容多元、赋权受众、协同共创和语境完整，为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概念框架<sup>[1]</sup>。

### 1.2 “建设性新闻”在中国的引介与本土化研究

2018年左右，建设性新闻随着媒体融合与社会治理创新的推进逐渐走入学界的视野，而后越来越受到关注。其背景与中国媒体在新时代的功能转型密切相关：一方面，媒体需继续履行“喉舌”功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另一方面，也要在复杂社会现实中发挥“凝神聚力、推动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中国语境下，相关讨论主要围绕三个层面展开：概念对接（与“正面宣传”“舆论监督”“讲好中国故事”的共鸣与区别）；实践探索（在环境、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建设性元素）；本土化思考（在中国体制下，实践的空间、边界与平衡何在）。其核心关切在于，媒体如何在服务国家大局与推动社会问题解决之间，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 2 案例剖析：“悬崖村”报道中建设性新闻的三重实践

本文以新京报2016-2024年间关于“悬崖村”的75篇报道为样本，采用案例研究法与文本分析法。案例研究旨在整体把握新闻实践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文本分析则系统解读报道的叙事框架、参与角色与话语特征。

根据对新京报报道数量的统计（见图1），2016年至2020年是“悬崖村”问题从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到通过易地搬迁取得关键进展的核心时期。2016年、2020年是报道数量的两个峰值年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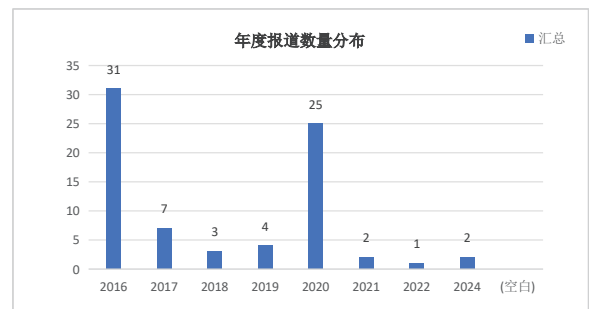


图1 年度报道数量分布图

从月份来看，2016年和2020年的5月是两个最为显著的峰值（见图2）。第一个峰值对应着2016年5月24日《目击 | 悬崖上的村庄》首发，事件进入全国公众视野，密集的“问题揭露”直接催化了地方政府的快速回应。第二个高峰期是2020年5月12日前后，悬崖村启动易地扶贫搬迁，此时报道功能从早期的“监督”转向“记录”，聚焦搬迁过程、新生活适应，并探讨可持续发展，标志着“悬崖村”作为一个紧迫社会议题的媒体叙事基本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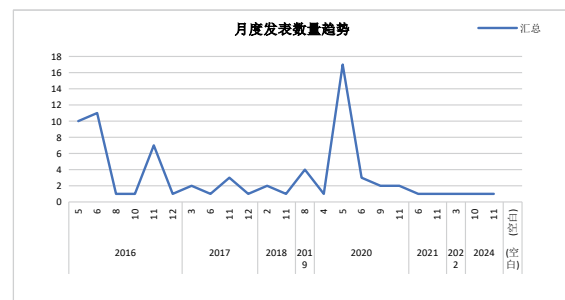


图2 月度发表数量趋势

### 2.1 叙事建构：完成从“地理奇观”到“国家治理史诗”的符号化转译

第一阶段：视觉震撼与问题锚定（2016年5月）。2016年5月24日，《目击 | 悬崖上的村庄》及视频《航拍悬崖村：孩子下课走“天梯”身后万丈深渊》，以极具冲击力的“悬崖天梯”影像，将“极端贫困”与“生命安全”议题锚定为公众情感的焦点。此时的叙事框架是经典的“问题揭露”，但其强烈的视觉符号——藤梯、深渊、背书包的孩子。一经发布便完成了议题设置，为后续的建设提供了叙事起点。

第二阶段：方案辩论与未来构想（2016年5月末-6月）。报道转向理性探讨，叙事框架具有明显解决方案导向特征。2016年5月25日《凉山“悬崖村庄”将建一钢筋梯道》在报道政府回应的同时，引述专家建议，提出交通、旅游、保护性开发的综合思路。5月26日发布《悬崖村连接现代文明的路有多长》的专栏文章则直接争论“先修路”的普遍必要性。《“悬崖村”绝壁天梯20年3D演示

《未来路怎么修》视频呈现用技术手段可视化解决方案。这一阶段的叙事核心是“路在何方”，各种解决方案在媒体平台上被并置、讨论，引导公众思考从“同情”转向“如何解决”。

第三阶段：进程追踪与成果展示（2016年8月-2020年）。随着钢梯开建，报道进入密集的“效果追踪”模式。《重访悬崖村1500根钢管打造新“天梯”接近竣工》《“悬崖村”两年之变》等报道，持续向公众反馈改变的每一步：“耗时缩短1小时”“第一个小卖部诞生”“网络接通、村民成网红”。叙事框架转为“改变正在发生”，这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期待，巩固了媒体公信力与公众的参与感。

第四阶段：模式升华与反思（2018年-2024年）。当个案改变累积到一定程度，叙事开始升华。社论《悬崖村扶贫：一个值得复制的扶贫案例》明确将个案经验提炼为可推广的模式。报道视野也扩展到其他“悬崖村”（瓦伍村、勒额基姑村），探讨共性与差异。同时，叙事并未回避新问题：搬迁后的就业适应（《易地搬迁后，“悬崖村”主播的去与留》）、政策执行中的个体困境（《留守悬崖村的外乡人》）。这使得整个叙事保持了建设性所必需的批判性张力。

从整体上看，“悬崖村”报道的实践历程完整，呈现了“建设性”的可闭环链条，而非单点曝光。其贯穿了发现和揭露问题-提供方案-催化行动-效果检验-模式反思的全链条，突破了突发新闻聚焦当下和调查新闻追溯过去的视野局限。通过这一完整的叙事路径，“悬崖村”从一个具体的地理名词，被成功转译为象征中国“精准扶贫”艰巨性、决心与成就的国家治理符号。

## 2.2 角色实践：从报道者到“资源链接者”与“进程追踪者”

如果说记者在调查新闻中的角色是“看门狗”，在突发新闻中的角色是“局外人”和“观察者”，那么建设性新闻中的角色更接近“解困者”“推动者”和“倡导者”<sup>[6]</sup>。在“悬崖村”案例中，新京报的角色实践超越了传统媒体的边界，体现了中国语境下媒体强烈的方案导向、社会行动导向与结果导向。

作为主动的资源链接者。报道不仅反映社会资源流动，更直接促成了其发生。最典型的例子是2016年6月的《视频直播|四川暴雨造成山洪记者给“悬崖村”孩子送鞋》。记者不仅报道，更亲自充当了“快递员”，直接参与了公益物资的捐赠。2017年11月《四川“悬崖村”天梯将安装微光路灯》的报道，体现了企业因关注报道而主动

联系政府并联合基金会完成捐赠的过程。媒体在此扮演了关键的中介和催化角色，将社会爱心与慈善资源精准引向被报道的客体。

作为持续的进程追踪者与监督者。该案例还展现出了鲜明的“结果导向”特征，媒体没有在引发关注后便“功成身退”，而是建立了长期的追踪机制。从钢梯修建的每次进展（2016年8月、10月、11月多次报道），到教育、网络、产业等衍生变化的点滴（如《1900多名“悬崖村”孩子免费寄宿》《“悬崖村”村民当网络主播成网红》），再到2020年易地搬迁的全程直播与系列报道，媒体持续向公众汇报“承诺是否兑现”“改变是否落实”。这种追踪本身既是一种记录，也构成了对地方政府履职的持续性政务监督，确保了“建设”进程的透明与可信。

作为深度介入的对话组织者。2020年5月发起直播《“悬崖村”变了，“脱贫”还有哪些可能？》，邀请人大代表等探讨电商、产业扶贫等持续性方案，将报道现场直接转化为公共议事厅。记者陈杰与主人公某色拉作的多次对话报道，体现了媒体作为“陪伴者”和“共鸣激发者”的深度情感介入。

## 2.3 话语协商：搭建多元理性与情感共鸣的复合话语平台

“悬崖村”报道构建了一个在“摆脱贫困、迈向美好生活”共识目标下运行的公共话语空间，其协商逻辑并非对抗式辩论，而是围绕共同目标的协同探讨。

报道有机并置了多元话语：国家政策话语（如“精准扶贫”）、专家理性话语、村民的地方经验与个体情感话语，以及网民的公众参与话语。这些声音共同聚焦于“如何更好地脱贫”这一核心问题，在修路与搬迁、发展与保护等具体路径上展开策略性探讨。协商过程中，政府方案受到监督，专家建议得到引介，民间呼声获得倾听，其目的始终在于优化方案、凝聚合力。这体现了中国语境下建设性话语协商的典型特征：在坚定共识下，实现多元主体对方法路径的理性探讨与情感补充。

## 3 讨论：建设性新闻本土化实践的内涵与反思

### 3.1 本土化特征鲜明：体现了中国特定语境下的“建设性”内涵

通过对“悬崖村”案例的剖析，可提炼出建设性新闻在中国本土化实践的核心内涵：

（1）以国家重大战略为叙事框架。“建设性”的最终指向，常常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等国家宏观叙事深度融合。媒体的建设性实践,实质上是在为这些宏大叙事提供了生动的注脚、落地的案例和民意的反馈。

(2)以问题的实质性解决为根本导向,即结果导向。中国的本土化实践追求“可见的改变”。钢梯的修建、新房的分配、收入的增加,这些物质层面的、可验证的成果,是衡量报道“建设性”成功与否的关键指标。对“可见的改变”的追求与持续验证,构成了本研究案例最鲜明的本土化特征。

(3)以媒体的“负责任协同”为角色期待。媒体不仅是社会的“瞭望塔”,更被期待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种“建设性力量”。这意味着在一定边界内,媒体可以且应当主动链接资源、协调社会关系、追踪政策效果,扮演一种积极的负责任的“协同者”角色。

### 3.2 批判性反思:建设性实践的边界与挑战

建设性新闻与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关系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在该案例中体现为三个核心问题:协商深度、角色边界与叙事平衡。

“悬崖村”报道的演变体现了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从早期关注集体解决方案转向持续追踪个体困境(如户口问题、身份转型)与后续发展挑战(如产业可持续性),从而在“希望叙事”中保持对复杂现实的审视,避免了简化社会发展长期性与曲折性的风险。

这一实践表明,建设性新闻可通过持续追踪与批判性反思,在推动积极议程的同时维系其客观性与人文深度。

## 4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新京报“悬崖村”系列报道的深度分析与研究发现,其是建设性新闻在中国语境下的一次完整、深入且特征鲜明的本土化实践范本,其核心在于构建了一个“叙事-角色-话语”三位一体的实践范式。

在叙事上,它完成了从“视觉奇观”到“国家治理议

题”的符号化转译;在角色上,媒体从传统的记录者积极拓展为资源的链接者、进程的催化者与效果的追踪者;在话语上,它构建了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共识、融合国家叙事、专家理性与个体经验的协商平台。

这一实践模式深植于中国的制度、文化与媒体功能认知之中,它回应了社会对“务实解决问题”的期待,也与国家重大战略形成了良性共振。其实践也提示我们需关注协商深度、角色边界与叙事平衡等潜在挑战。

“悬崖村”系列报道,是一场关于新闻如何参与社会建设的生动实验。它表明,建设性新闻在中国并非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一种基于本土逻辑的创造性生成。它为媒体在更广领域发挥建设性作用提供了富有启示的范本。

### 参考文献:

- [1] 徐敬宏,郭婧玉,游鑫洋等.建设性新闻:概念界定、主要特征与价值启示[J].国际新闻界,2019,41(08):135-153.DOI:10.13495/j.cnki.cjic.2019.08.008.
  - [2] HermansL,CathrineGyldensted.Elementsofconstructive journalism[J].Journalism,2018,20(2):535-551.
  - [3] 凯瑟琳·吉伦斯特德,麦金泰尔.建设性新闻:一种积极的新闻实践形式[J].新闻记者,2018.
  - [4] 漆亚林.建设性新闻的中国范式——基于中国媒体实践路向的考察[J].编辑之友,2020,(03):12-21.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0.3.002.
  - [5] 翁之颢.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的“建设性”探索:本土诠释、关键问题与未来面向[J].中国编辑,2020,(07):33-37.
  - [6] 史安斌,王沛楠.建设性新闻:历史溯源、理念演进与全球实践[J].新闻记者,2019,(09):32-39+82.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9.09.004.
- 作者简介:张可欣,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